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
Overseas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丛书主编：魏海生

奇迹的建构 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

country's
implemen
rural refo
the village
the village
of the vill
aims of un
various at
sanitation
democrac
maintaini
populace.
The ne
from the
state-own
under the

Achieving the
Miracle



王新颖 主编

Overseas Academics on China Model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奇迹的建构

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

Achieving the
Miracle

王新颖 主编

Overseas Academics on China Model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王新颖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8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魏海生主编)

ISBN 978-7-5117-0690-4

I. ①奇…

II. ①王…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9678号

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

出版人 和 龔

丛书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珺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总 序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急剧扩展，世界上到处都在述说着“中国故事”。2009年，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可能的未来景象”，提出“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与此相反，2010年，美国国际投资分析师麦嘉华、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戈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甚至将走向崩溃。至此，关于中国的“统治说”与“崩溃说”在全球文化语境中各执一端、相互矛盾。这其中包含多少学理上的探究和现实中的策略尚待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在当代全球体系下，“中国”已成为全球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词汇，“中国研究”正牵动着世界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力图让海外学者的视角、眼光更多地投射到我们的视界，使我们听到更多的来自世界的各种声音，而这种眼光与声音越真切清晰，越有利于我们的判断与辨析，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以多重向度理解自身的借镜。

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已深置于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各个领域的跨国化进程使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显得愈加紧密而复杂，作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正在以某种有别于其传统功能的方式，全面介入当代世界的关系体系。而历史上两大阵营的关系模式，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模式、中心/边缘理论等都无法诠释当代世界的复杂图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建构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参照系，多向度地反观时代，主动寻求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精神资源，既是各国经历现代性进程中的共同命题，同时，作为现代性共同体，藉此过程辨清自身的方位也更显必要。康德曾用“先验幻象”的概念指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使命，我们也有责任对某种封闭的执信保持警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在国内外一片赞誉声中，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充满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警示全党：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面对“四种考验”、“四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更加理性地、更加包容地听取不同的声音，关注来自国内外各方学者的思想成果。这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这样一重思想话语与认识维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固有的视域之外窥到自身的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国家的认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明视角下的内在逻辑，从而更有效地思考自身相应的策略，同时，这种认识上的互补性也可导向多种精神资源共同面对和审理对于当代世界的多层意义的解读，进而与当代全球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馈。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实的变迁而

更加全面地展开。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最具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中加以关照。

可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提供的是一个多角度的理论棱镜，所折射出的不仅是海外学者对于当下中国几个重要问题领域的观察与回应，同时，也从知识论、方法论的层面带来了多元化的问题线索和认识方式。丛书所选论著的诸位专家学者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国度，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派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所秉持的理念、意识也迥然有别。因此，其观点本身既包含着深刻的见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在观点与观点之间，既有共识，又有对立，既有交叉点，也有相悖处。事实上，这些又恰恰反映出问题对象的当下性与可讨论性。另一方面，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甚至相互抵牾的结论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阐发也的确需要经受这样的一种检验。就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复杂结构而言，很难以某种单一固定的结论将问题进行整体性化约，因此，编选这套海外学者的学术论丛，我们着力呈现的正是这种丰富多元的论证角度和对问题的探寻过程，从而在比较宽阔的视域内发掘更多的可能性。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并置于一个开放式结构中，既是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审慎和包容，也力图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与思维向度。

我们看到，由中国引发的世界回响仍在持续，我们的丛书也将逐步拓展领域，成为一个陆续编选、出版的系列，以期更加多元化、多层面

地展现海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考语境。另外，该丛书所选文章的观点均为作者观点的客观呈现，不代表丛书编者的认识倾向。

谨序。

魏海生

2011年7月5日于北京

导言 海外视阈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一、“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

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海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2002 年，卡瓦吉特·辛格（Kavaljit Singh）首次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①。2004 年 5 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的研究报告，可以被看做是西方第一次系统提出的中国发展道路理论。“北京共识”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求发展。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快速增长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②“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

① 庄俊举：《“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见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8 页。

② 详见乔舒亚·雷默：《北京共识》，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阐释，它的重点被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对抗的功能上，但这一点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同。更多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①

“中国模式”的出现和受到关注，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认为接下来即将崩溃的就将是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被相继抛出，继而引起全球性争论。但是，中国历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依然保持快速平稳的增长，在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中国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道路；这条道路既否定苏联的完全公有化，也破除西方的极端私有化；这种“混合模式”创造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奇迹”吸引了大量海外学者的目光，他们认为这里面的发展经验值得总结。与此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拉美、东欧和亚洲的停滞和衰落，人们在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奇迹背后的含义，探求中国发展模式的奇特性和可复制性，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中国模式中可借鉴的经验。

二、海外“中国模式”研究回顾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模式”研究的兴趣和关注，大致始于新世纪之初。一些高校、研究机构召开了“中国模式”研讨活动，出版了一系列文章、论文集、专著。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见解和评论。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

^① 李抒望：《独领风骚的“中国模式”——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载《济南日报》，2009年5月27日。

到,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①

1.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关于这个问题,海外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看法。第一,认为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它造就了中国30年稳定而高速的发展。世界银行前驻中国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认为,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不断扩张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那么就得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第二,认为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现在提出为时过早。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为时过早。第三,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模式,它只是东亚模式的模仿和“华盛顿共识”的翻版,30年的成就可归结于“实用主义”。美国前副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 Shirk)、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都持这种观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认为,中国在“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方面都难以找到既有独特性又有可复制性的因素,因此难以判断“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2.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罗万·卡里克(Rowan Callick)的观点在西方具有代表性,认为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自由经济加威权政治,即“威权资本主义”。还有一些人强调“中国模式”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问题专家

^① 以下内容详见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模式研究子课题组:《概念、特征、影响及趋势——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载于《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指出政府主导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总结了“中国现代性”的8个特征，其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中国模式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有人强调“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有人强调混合所有制及渐进改革战略。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主要特征是威权主义，在此基础上，有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有人强调学习汲取东亚、西欧、拉美的经验教训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存在一种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纵向民主”（如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还有人认为中国是列宁主义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体系。

3. 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西方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例，甚至是另一种现代化道路；另一种观点以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而且发展过程中存在巨大缺陷，中国模式不可复制，不可推广和输出。

认为中国模式可以复制的，就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替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因此将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西方，这是以英国剑桥大学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不可复制的，则认为中国模式对西方不是威胁，例如左翼理论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认为，中国重组当今由西方主导的国家等级体系，或许会带来国际上更大的平等，中国或许比欧美更少军事色彩，而更多和平倾向。

4. 中国模式前景如何？

西方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政治稳定、民众信任中央政府，

尽管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巨大挑战，中国仍可以克服困难，保持高速增长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和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J. 安德森 (J. Anderson)]。以美国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首席分析师 P. 蔡汉 (Peter Zeihan) 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无法解决存在的问题，改革已有心无力，未来不可持续。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无法预测其前景。

三、本文集所讨论的问题

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非常热烈，成果也很丰富，但是观点和分歧非常大。我们想做的是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和呈现，使国内了解海外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细节，为国内学界把握住这一话题提供帮助。因此，这些整理翻译编辑工作既有分析上的实用意义，也有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编辑本文集的原因和目的。

这部文集主要收录了 2007—2010 年间发表的海外政治、经济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和发现。文章收录的原则首先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进行探讨的论文，短评、访谈文章不在本文集的收录范围内；第二，所选文章的作者均为国外出生的外籍学者，海外华裔学者的文章没有收录；第三，文集所选论文均来自国外公开出版物或会议论文，均为第一手资料。文集主要从内涵、经济维度、政治维度和比较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加以阐释。

1. “中国模式”的内涵

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海外学者们主要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北京共识”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中国模式不是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中国模式基本不会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起挑战；中国模式的定义没有任何共识，它不是简单的政府退出和自治市场领域复苏；中

国模式的奇特之处在于制度创新的能力和过程；中国经验不能照搬；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异显著；中国模式是接受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中国战略走向成功就是要寻找由民族和地区层面整合带来的新的认同。

印第安纳大学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梳理了对“华盛顿共识”的误解、修订和挑战，为理解“北京共识”观念出现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批评性的背景。他认为，“北京共识”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的一种误导性的分析之上，中国国内大部分观点是批评“北京共识”的。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战略依赖于“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构成要素，中国那些独有的要素不过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补充，而不是挑战。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定义没有任何共识，有人认为是权威资本主义的一种隐喻，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渐进主义转型的同义词，在中国更普遍的说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延伸。肯尼迪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提议者是想让我们相信，中国的经历直接打破了“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但是，传统经济学的灵活程度足可以解释中国的情况，足可以与中国的情况和平地相处，它恰恰削弱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中向正统学说提出挑战的那些原理；尽管“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作为对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对抗力量而赢得了共鸣，尽管世界的治理体系需要进行某种调整以适应中国不断增长的作用，但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挑战，来自中国的可能性极低；那些威权主义国家不能盲目照搬中国的经验。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考察了对于中国经验认识的两种体系：从政治意义出发的（核心是坚信成功的经济发展为政权提供了维持权力和稳定的各种资源）和从经济意义出发的（核心是坚信政府退出市场是经济成功增长的关键）两个体系，指出这两种普遍看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矛盾。他认为中国渐进的市场化不能片面地描述

为简单的政府撤出和自治市场领域的复苏，相反，市场化始终都伴随着制度变革和创新的过程。这些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出现于国家制度框架内部，它明显不适合那些体制特征完全不同的其他国家模仿。如果中国发展经验中有什么东西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效仿的话，那可能就是为制度创新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而照搬中国的“国家制度创新体系”是没有意义的。

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A. B. 维诺格拉多夫在他的《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前景》一文中，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比较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他认为，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以与自然界建立和谐关系，从而将其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程度为目标。中华民族的成长遵循自然规律，从来不会为了建立使自己舒适的空间而企图直接改变外部世界。中国的宗教哲学理论并不是以建立全新社会为目的，他们的理想是尊崇古代智慧和传统。对外界环境缺乏扩张性动机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经济奉行满足数量有限的、极为节制需求的方针，而不是扩张和创造人造大自然。在这种文明基础上，中国形成了以国家负责各方面发展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衡量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不是征服自然的程度，文明的基础不是扩张，而是节制。由国家建立的各种维持现有关系的机制保证了财富积累的连续性，但与欧洲方式不同，这些机制并不是要扩大再生产，而是要限制需求。在与西方文明的交往过程中，以稳定、和谐为本的中国无力抵御对其固有的历史经验来说完全陌生的外族扩张。

随后，作者分析了中国 19 世纪至今文明发展的路径：接受全球化；接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导致了现代与传统二者之间从冲突转向统一；从整体改革的一次性行为转变为与追求世界高水平发展类型相适应的改革，即“北京共识”。作者认为，在中国成功适应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西方还没有做好准备应对与物质文明不相关的新挑战——非法移民、内部社会文化与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这是对西方文明潜在的大挑战，它触及了西方文明的道德和价值基础。文明内核的脆弱性可

能比扩张经验不足更为严重。西方国家正处在 18 至 19 世纪的东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阶段，当时东方国家正在寻找抵御欧洲文明渗透的办法。东西方再次站到了对立面。中国对包括改革过程在内的各种稳定的生存方式进行过大量文明尝试，这使其能从全球性的文明危机中走出来，并在现代得以延续。21 世纪中国能取得成功的战略是要寻找由民族和地区层面整合带来的新的认同，而不是走向全球。这一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在扩张与孤立主义、普世主义与同一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世界历史中，扩张往往与普世主义阶段相联系，而孤立主义与同一性相联系。中国需要找到他们，首先是扩张与同一性的新的结合形式，还要为文明认同的最重要元素构建新的道德标准。如果中国在战略选择上取得成功，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需要适应不断增强的中国影响，寻找与其和谐相处的方式。

2. “中国模式”的经济维度

在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几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不仅造就了中国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分化等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具有特殊性，它并不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罗斯·加诺特分析了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了发展的一般经验，还总结出了中国发展的几个特别经验：一是始于农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具有突出优势；自由贸易在一个大国实现快速、国际化发展中具有重要性；渐进改革具有优势。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乔尔·安德斯以乔万尼·阿瑞吉的《漫长的 20 世纪》为引线，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使用布罗代尔的以资本和国家关系为重点的资本主义定义，来评价阿瑞吉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即中国可能开创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的建议。作者认为，中国或许能够带领东亚重新夺得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和最富裕地区的地位，但是照目前情况看，这个发展将只是翻新而不是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秩

序。但是如果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实际上能够从边缘走向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将大大地改变全球等级体系,这样的改变将有助于缩小在北大西洋主宰的时代国家间和地区间极度的全球不平等。这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和非常积极的变化。

西方许多分析家认为,受到世界贸易组织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必然会终结,而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则通过对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益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以及面对全球化的威胁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评价,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与强大国家干预下的“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尽管存在着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但是“中国模式”已经度过危险期,抵御能力会越来越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 1978 年以来的市场改革政策带来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有能力成为非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经济助推器,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美国经济学教授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对此持否定态度,提出了四点:第一,中国并非正在开创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而是已经恢复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事物。第二,归功于 1978 年以后经济改革的成就被过分夸大,中国改革的早期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这种经济基础正在遭到破坏。第三,经济改革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对普通劳动大众是不可接受的。第四,中国的转型并非中国的独创,在积累动力与投资 and 贸易的主要模式联系越来越紧密时,中国的转型只是强化了东亚经济体,而不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中国的积累过程依赖于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的运转,所以中国不仅无力承担主导全球经济的角色,而且其自身改革实际上强化了已有的权力结构,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政治关系紧张。因此,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否接受“中国模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3. “中国模式”的政治维度

政治维度突出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战略上的转变。

法国经济学家让-克洛德·德洛奈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在社会关系的变化问题上，中国明确地选择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德洛奈分析了经济领域与社会主义架构，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受到国家有力影响的混合型经济。中国社会的变革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变革，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关系非常薄弱。尽管当今的变化为资本主义关系提供了发展空间，然而并不能就此认为这种经济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在探讨中国的政治领域与社会主义构架问题时，不能说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距离资本主义还很远。大多数中国人向国家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人权，而是某种集体安全以及继续寻求伴随着经济开放政策而出现的个人占有的可能性。

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则认为，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是中国的未来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却继续信守社会主义的未来。自1989年之后的二三十年来，中国融入了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这需要抹去早年革命社会主义的最后遗迹，因而使官方的社会主义声称不如以前那样令人信服。尽管革命的历史已经被抛弃，而且还要应对当前危机所提出的挑战，可能不得不利用过去的一些重要遗产。“后社会主义”为这样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

这本文集还收录了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赫尔穆特·彼得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世纪到社会主义》著作的一章：《中国政治：在追求原有目标进程中的战略转变》。在这一章里，作者详细论述了中国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战略转变，它是思想上、政策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首先分析了胡锦涛执政之初的社会